

乡土日本

[日]柳田国男◎著 杨田○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乡土日本

[日]柳田国男〇著 杨 田〇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日本 / (日)柳田国男著；杨田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02-49649-6

I. ①乡… II. ①柳… ②杨…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日本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3877号

责任编辑：孙元元

装帧设计：谢晓翠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4mm×230mm 印 张：15 字 数：158千字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59.00 元

产品编号：076650-01

|序一|

以工匠精神认知乡土

接到邀约为柳田国男先生的专著作序，甚为惶恐。我30多年来一直在民间文化研究机构工作，对相关学科并不陌生，对柳田国先生的学术地位也有所了解，但照理说，只有该领域的学术大师才有资格担当此事，既是对作者的尊重，又是对学术负责。因此“不合适”是第一反应，但出于对柳田国男先生著作先睹为快的兴趣，所以答应出版社先读书稿，如有心得和拙见可以成文，再由出版社酌定是否为序。啰嗦几句，算是为不自量力所做的开脱。

可以说，将存在于乡土的大众日常生活赋予创造和承载历史的意义，并将这种发现意义的方法体系——民俗学作为一门学问不断完善，同时坚信这门学问的实践和应用，可以使社会变得更好，是柳田国男先生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的起点。他眼中的“常民”或者说平民的生活文化，既是完整民族国家历史的必需品，又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需品。以价值关怀作为学术追求的原动力，综合文学、法律学、政治学的学术背景和从事农政工作的社会经历，与他的民本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柳田国男先生学术实践的轴心，这是我的总体印象。

对相关问题的不断追问和认真务实的工匠精神，放眼世

界的学术视野和系统研究梳理的研究功夫，是我读完这部著作的直接感受。例如先生对文化研究有这样的评述：“文化的复合（cultural complex）并不存在固定的形式，并不是一方若不退出，另一方就无法进入，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的相互让步之上。一种举动或是想法，如果显得和普通风潮格格不入，这一定是因为它要么是太新潮了，要么是太落后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外部冷眼旁观才会发现真正的矛盾，而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根本意识不到存在的问题。繁华的都市中也有乡村，现代中亦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过去。我们得庆幸自己生活在这门学问的宝岛。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还去硬搬外国的例子，将研究对象局限于一些让人勉强发笑或是吃惊的事情，肆意收集或是妄加揣测，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学问还仅限于机械的模仿阶段。”要注意的是，这是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之后，一位日本学术泰斗的学术感言，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就这个话题，联想一句耳熟能详的学术熟语。常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互交融，和而不同。但在很多的实际的研究实践中，往往是专注于差异性的学术范式成为主导，简单机械的学术模仿和直接套用也不在少数。对共性的、关联性的问题缺乏细致的、系统的、全面的学术追问和梳理。例如：相互交融遵循的是什么规律？有哪些交融的类型？哪些文化现象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呈现出这种规律？在中华文明这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之中，变与不变的是什么？……要做好这方面的功课，在治学做事中应该倡导一种工匠精神，我想，所谓工匠精神，至少应有这样的气质，安静且持久，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真功夫。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天天放“原子弹”，不可能10年就出

大师，不可能一开会就是高峰论坛。

举本书一例说点感想，在“乡土日本民俗资料的分类”一章中，梳理了30个文化要素展开记录和研究，这里不讨论类型的划分是否尽善尽美，仅就其中一个劳动范畴中的学术关照，作者是这样总体表述的：“劳动问题范围很广，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考虑：（1）劳动组织；（2）劳动种类；（3）劳动者的身份或名义；（4）报偿给付方式与分配；（5）休息（指农休及其他常规休假）。另外，村落、合同与婚姻等不划入劳动问题的范畴，在后文中还会单独立项介绍，但由于这些都与劳动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想在这里不拘泥于具体的分类，而是把它们适当地掺和在一起去进行阐述。”全章节细读下来，仅就劳动组织一方面，就从首领、英雄、地主、亲属、婚姻、家庭、伙计、家仆、佃农、制度、分工、最小单元、劳动事项及称谓和语言等要素上加以梳理。这就要求从尽可能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给予关注，要求对历史变迁和横向对比，进行系统性研究——这真的是极高、极细的学术要求，使人感到文化的记录和描述真是没有尽头的。再加上从民谣、方言、古语中对劳动关系、组织的规模、分家（在方言中如何表述）习俗等材料获取的技术和对比研究的视角上的关注，深感“编织”文化之网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和精细。再如说到报偿一项，关于支付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和内容，从食物、实物到货币的历史演变，先生是这样思考的：“我们需要收集目前全国尚存的诸多种类的报偿支付方式，并按其类型横向排列出若干个层次，借此了解支付方式的变迁历史。”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学术基础研究，能有多少学人参加，真是值得思考，难怪柳田国男先生感慨学界“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

的‘学问的宝岛’视而不见”了。

柳田国男先生用“临渴掘井”形容日本为时已晚的乡土社会研究，提醒人们关注乡土社会，不能期待一蹴而就的功效，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就算做不到未雨绸缪，即便是临渴掘井也比什么都不做强。对应我国的“三农”问题，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程度可说是与日俱增。时至今日，我国广大农村及其所承载的人群（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因为长期的资源输出和急剧的文化转型，构成了乡土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状态，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逐渐成为发展的短板，成为社会“帮扶”和“反哺”的对象——解决三农问题，也有临渴掘井之感，此时“掘”什么样的“井”，用什么方法“掘”大约是首要的问题。面向未来，在我们现代化的蓝图中，是否还包括具有熟人社会性质、村落意义的、远离中心城市（直至边疆区域的，有的地方似乎不那么宜居）、与农、林、牧、副、渔等传统生计方式密切相关的社区？如果有，它们与城市生活的异同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异同又是什么？是像城市那样的同质化状态吗？如果是多样性的存在，它们各美其美的文化资本是什么？解决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前工业时代的农耕文明会有所贡献吗？这似乎是对当下农村价值关怀的起点，也是价值关怀的基础。很难想象缺少生机勃勃、充满文化自信的农村，我们的现代化是完整和全面的。

从文化的视角看，问题并不复杂，具有全局意义的乡土社会传统智慧不是城里人的纪念品，而是要全面伴随城乡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财富。农村不仅仅是城市的后花园和修剪花草的园丁。价值的低估和利益诉求的功利化，使得对乡土文

化认知的表面化、碎片化和利用的商业化成为常态。这种常态，似乎使社会更加坚定了乡村是落后的，城市是进步和发展的象征这种片面的文化认知。令人担忧的是，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条件下，要去振兴乡村，要去帮助农村，要去搞旅游开发，要去搞民宿……很难在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有所建树。

因此，必须重新评估农村在未来国家发展总体框架中的基本价值，系统全面地展开相关研究，精准认知农村社会发展历史的、内在的运行规律，切实从社会建设和人的发展等基础性工作入手，多一点田野作业，少一点闭门造车，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推动乡村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与柳田国男先生的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日本乡村建设，应该成为我们进行中国乡土社会研究和建设的有益参考。

史料的采集和田野作业的理念与方法；对比研究的视野；资料的分类梳理；对语言和口头传统的重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不断提出疑问的态度，等等，在方法论意义上，柳田国男先生的这本专著，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借鉴。关照到我国当下的乡土文化研究，大概除了记录、档案等完整历史文化的意义之外，还要关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要关注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和谐，这或许是当代学人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

我任职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作为国家民族民间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自2007年起，长期对一个水族村寨，展开记录为主，但同时关注发展变迁的实证研究。一开始，在应用研究的基本诉求上并不复杂，一是从多民族贫困地区乡村旅游与文化保护利用之间的关系着眼，二是从社区日常生活的视角关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

历经10多年的长期田野工作，大家从文化记录的角度，将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村落的文化事项从历史、自然、空间、民居、营造、生计、生活、风俗、传说、地舆、组织、姻亲、祭祖、家园、神灵、水书、民歌、技艺、礼仪、节日、立法、超自然世界、礼物、现代用品等20多个类型、200多项具体事项进行似乎全面的梳理记录，但总有不完整、不全面的感觉。实际问题的复杂是由于当传统与发展并行时，变迁过程的动态性和关联性之复杂，对老百姓来说显而易见的文化事项，常常使外来者觉得不可思议。例如，山地稻作文明系统中，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和财富的象征，依据传统，村里的“牛班”制度（按户以一天为单位轮流为全村放牛），很好地解决了牛的日常管理。平均每户一年只占用约五天时间（两个多月轮一次），每次用一个白天的时间放牛——老百姓通过协同切实落实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并且管理成本几乎为零。除此之外，有牛与村落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视角，还有牛与重大礼仪活动、祭祀传统中牛的使用等问题。但是，当出于卫生考虑要解决人畜分离问题时（在广大西南地区，干栏式建筑的传统使用方式都面临的转型问题），集中养牛既是大家的意愿，又使人们陷入纠结——集中养牛使社区传统伦理面临挑战的事项复杂得出乎意料，牛圈地址、牛舍的数量、夜间的管理内容、管理人员的性别、责任的规定、事故的可能和纠纷的解决，直至牛粪的分配，等等，就连垫圈的土从哪里取大约都会引发讨论。如果用简单、主观、经验主义的思维定式，加上粗放的同质化解决方案，事实上非常容易使这件“小事”落入市场经济思维模式，从而在本质上中断了这个文化事项的核心价值。这或许是很多惠民工程做不成民心工程的深层原因。中国有句老话，叫“牵

一发而动全身”，从文化意义上讲，百姓身边无小事，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想说明的是，从学术意义上讲，在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将“现代的、西方的城市”与“中国的、传统的乡村”二元对立，将某一方面的文化存在不恰当地扩大为中国文化。这种学术上的裁剪和放大，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也容易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学术组织建构的陷阱，不利于跨学科融合，以及在同一学科中不同的研究方向之间建立融洽的学术合作关系。因此强调对乡土社会研究的关注，并没有把它看成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属，也无意褒贬热心学科建设的专家，只是从一个外行的角度，觉得这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学术共同体一起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柳田国男先生关于风雅和凡俗的辩证思维，对平民生活和上流社会的关联性关照，以及乡村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等，似乎他的关注点并不是学科建设和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全面思考和实践，正应和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干什么常常比叫什么重要。

以上是读书心得，也有借题发挥。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李松

认识过去，省思现状

柳田国男是现代日本乡土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本书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正是日本工业化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社会的变革、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冲突、更替使人们对乡土的关注程度空前。

过去的历史书写与记述仅限于权贵与“重要”的事件，所以关于平民的文字记载十分有限。那些维系传统社会运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方式、制度、事实等，都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了。这正是20世纪初德国、法国史学家提出新史学观念的突破口。《历史综合评论》的创办人贝尔提出，历史不应是“事件”和“经验”的历史，这一思想孕育了后来的法国年鉴学派。柳田国男对日本乡土的研究与这一学术背景息息相关。他认为，乡土研究就是要了解普通民众的过去，并让他们了解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而“自我反思”。

本书的前五章讨论了民俗学的总体背景与必要性，作者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日本乡土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英、德、法等早期工业国家乡土领域的状况、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强调了乡土研究对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潜在意义和重要性。

其中一些观点对今天的中国民俗学或与之相关的领域

(如遗产学、社会学等)仍具有启发意义。

在方法论方面，作者对当时史学界只注重考古器物与文字记载，忽视“活人所持有的信仰、情感、行为和记忆”所传达的信息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没有文字的历史并不代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如何打破贫乏的文字记载的制约，用新的方法采集有价值的资料，便成为乡土研究的重要基础。作者继承了19世纪末西方史学界重视“偶然记录”史料的方法，认为其中可能蕴涵很多真实和重要的历史信息，并详细论述了如何获得有价值的“新资料”的方法。比如作者提出，乡土学者在采集资料前应该进行专业的训练，以便能够较准确地辨别哪些是“过去的遗存”，哪些是“新近的流行”。

要研究乡土，就面临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知识系统的问题。当时学者们将“与普遍性的风气和习惯格格不入”的“所作所为”与“思想观念”定义为“古风”，拉丁语大致为“superstition”，但这一概念在英语的含义为“迷信”。作者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个古词，早在基督教普及欧洲大陆之前也已存在，本意是“旧习遗存”。把“古风”或“乡土”释为迷信，有贬义之嫌，显然不利于乡土研究的发展。

乡土研究可以让人们了解活着的传统，我们不应厚古薄今，甚至认为文化越古越好，因为历史始终是变化着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因为今天的词或概念与古代相同，就武断地推测该词或概念的内涵与过去相同。古风的演变过程是由“无数细小的变化组成”的，同时又有连贯性的东西。这种变化越是处于文化中心地带，就越明显，速度越快；而处于偏远地区的变化就相对缓慢。所以，比较调查就显得十分必要。

当人们要想跨越传统的选择性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历史时，就必须以实地调查为主要依据，而不可以“理论和想象力”弥补因资料匮乏而造成的证据链条的缺失部分，也不能以“仅出现过一次的事件来推测整个时代的状况”。

在实地调查研究中，作者强调，乡土研究应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通过研究习俗、生活方式的发展与演变，人们可以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根源有更深入的认识。在乡土研究中把握事物的意义，弄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地方的传说或古老记忆，只有跨越本地传输到远方才会显得神奇，会“促使人们考虑传说与整个国家整体、乡土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一般来说“古态的东西”基本都与“信仰”有关。“那潜藏于外表之下的意识和情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了传统，形成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并置和“混搭”，而没有全盘西化。

“文化的复合并不存在固定的形式，并不是一方若不退出，另一方就无法进入，而是建立不同文化的相互让步之上。”所以“繁华的都市中也有乡村，现代中亦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过去”。所有这些对今天的中国学者思考“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村”这类的问题，都极具现实意义。

书的第六章是对“日本乡土”内容的具体论述。受当时西方社会学和新史学观的影响，唯物史观或“功能”逻辑贯穿了本章的整体结构与内容安排，包括文化部分、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

作者对农村劳动的研究颇有见地，从劳动组织、劳动种

类、劳动者的身份、报酬方式与分配等方面记述了相关的风俗与社会现象。在传统农耕社会，保持家庭劳动力的规模是头等大事。日本乡村曾有类似“走婚”的制度，群体化的共同劳动方式还产生了日本田间特有的干活的场景。另外，书中还涉及女性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劳动分工的角色与相关社会现象等。作者指出，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良、家庭的小型化，日本妇女越来越少地参与生产劳动了。本章还讨论了当时日本农村的一些类似社团组织的情况，对我们了解日本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令是日本传统社会重要的内容，其中很多受到中国农历习俗的影响。作者较系统地研究了像阴历的“朔日”，每月十五，初七、八（上弦月），二十三、二十四（下弦月）时的习俗、社日礼仪等。这些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古代风俗的影子。在祭祀和竞技的研究中，作者认为“竞技是与祭祀及年中行事不可分割”，因为“所有竞技都是占卜演化而来”。

在我国，古礼的很多内容先秦文献就有较系统的记载，如《尚书》《左传》《礼记》等。从明代开始，方志的编纂蔚然成风。由于历史的原因，从辛亥革命后，很多乡土的东西逐渐退出社会舞台，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传统的彻底否定，我们对自己乡土的研究欠账很多。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的多源、融合性强，加之地理差异大，传统社会“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现象十分普遍，各地的方言、戏曲、饮食、民居的形式等存在巨大差异。近代西风东渐，各地传统与现代的交错的情况更为复杂，所有这些都需要大力开展民俗学或乡土学，以便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过去，省思我们的现状。虽然柳田国男的《乡土日本》一书出版于

20世纪30年代，但对今天中国的乡土研究仍有现实意义，而且我们也可从中隐约看到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习俗的一些看法。

本书是别人根据柳田国男先生的讲义和访谈整理而成的，所以口语化明显，行文显得轻松、平实，可读性很强。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书中对当时日本乡土的一些现象的描述，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消亡的传统或过去存在的乡土。这或许会给今天的读者带来信息的混淆，读者可能难以分辨哪些是故去的传统，哪些是作者写作时仍存在的民间习俗。如书中提到了日本农村婚姻习俗从传统的“入赘”到“出嫁”方式的改变，以及“媒人”的出现等，但书中没有介绍这一变化跨越了多长的时间。这对于当时了解日本历史的读者可能无大碍，但对于今天中国的读者来说，就要注意辨别这一类的信息或资料。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杰

2018年仲春，清华大学荷清苑

乡土研究是什么

眼下，乡土研究正在各地展开，大家亦可经常听闻或目睹乡土研究的课题，其名称已广为人知，历史也算是久远。但仔细观察之，由于地域及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乡土研究在整体上该如何去做、做什么样的事才是正题，这应该是每个认真思考乡土研究的人都会产生的疑问。同时，乡土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乡土研究能否给当前的“更生运动”¹带来好处？乡土研究是否是当前的当务之急？换言之，当前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我们却要拿出一半精力去从事乡土研究，这究竟是否值得？我相信这样的疑问，肯定会萦绕在大家心头，挥之不去。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此项事业能像吃了退烧药后体温立降、喝了酒后脸立马变红那样速效，也从未如此保证过。早在很久之前，我就曾提出，一定要开展此项研究以备将来之需，但一直以来都没取得什么进展。现在大家意识到乡土研究的重要性了，但时间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没办法，我们只能临渴掘井。感到口渴才匆匆掘井，这固然可笑，却也比什

1. 20世纪30年代，日本陷入经济危机，广大农村面临破产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各地方自治体展开了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的运动，力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简称为“更生运动”。本书的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么都不做、在那儿傻等着要好得多。和人短暂的一生不同，国家的生命要长得多，虽说是有些迟了，但如果从今天开始着手做的话也许还来得及。更何况现在并不是白手起家，很多工作已经开始在做了。其实，我就是想通过乡土研究给世人提供一点有用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我想我比任何人的愿望都更为强烈。恰巧我的身份地位不高不低；近年来从事或大或小规模的地方研究的人员中，我也都有一些熟人，而且这些研究项目和我也多少有些关联。所以我既了解乡土研究的长处，又深知其中的不足。其实对诸君来说，只要掌握必要的要领，知道对乡土研究该持有的态度，以及将来如何善用乡土研究的成果就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去听我啰啰唆唆说那么多。我相信在大家中肯定有不喜欢这项事业却被硬拉进来的，也有因太喜欢这项事业、深陷其中而困扰的，对这些人简单介绍乡土研究的社会意义就非常重要。对于这样的工作，我想我还是能够胜任的。

简言之，乡土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了解平民的过去。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即通过乡土研究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解决那些在当前社会实际生活中，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依然没有得以解决的问题。对我们这样的平民来说，了解平民至今所走过的路，其实就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是“自我反思”。有些人自以为，如果是自己的事，那肯定是无所不知的，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细想一下你就会意识到，走到今天，你其实忽略了很多东西。倘有人发问，无法回答之处比比皆是。对于平民的历史，我们一定要重新研究，要本着谦虚的态度，去进行新的探索。关于平民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东西非常少，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即便是记忆力很好的人，也很难叫出自己曾祖父母的